

※俄蘇東方學系列之阿列克謝耶夫專輯：「新」中國批判※

必也正名¹：「新」中國批判專輯後序²

班科夫斯卡雅^{*}著 陳相因、王上豪、徐子芳^{**}譯

我尤恨年輕而愚蠢的、
打著上帝的標籤卻又反上帝的人們，
猶如藥房裏的瓶瓶罐罐。
——瓦·米·阿列克謝耶夫

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中國文學論文選集》(*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³序言的第一頁，艾德林(Л. З. Эйшлин, 1909-1985)雖沒有指名道姓，卻以一種不友善的用語「昔日的論敵和揭發者」來緬懷悼念阿列克謝耶夫——可惜的是，鉛字無法傳達苦辣刻毒的語氣。「瓶上的標籤」，這個飽受憂患艱辛的隱喻，我父親這些苦辣刻毒的話語，被我拿來當作這篇文章的題詞。阿列克謝耶夫身上的標籤比勳章還多得多，而且可以這麼說，恐怕是來自不同類型的整套文件——諸多評論和文章，重要的是針對這位剛愎固執的院士，在意識型態上做仔細審查「改造」的相關討論會議紀錄。這顯而易見的材料，在期望中總是喚起我們對一般的社會問題的

* 班科夫斯卡雅(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1927-2009)，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研究員。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王上豪、徐子芳，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生。

¹ 原文為“Выпрямляя имена”。

² 本版本的所有材料皆具確實性(供述大部分都出於阿列克謝耶夫之筆)，當然無法完全闡明主題，但是文章主張與描述的真實性卻可以補足這個不足。我們提醒讀者，出自於阿列克謝耶夫家居檔案的材料(由班科夫斯卡雅保存)並未標明引文出處。

³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В. В. Петров, 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Л. З. Эйшлин. М.: «Наука» ГРВЛ, 1978.

思考：在僻巷內什麼樣的腦髓皺摺會產生一種咬住親近同事不放的需求——這正是知識分子（阿列克謝耶夫此類型的論敵絕對不會是外行人）罹患的精神苦痛？我甚至想把自己這篇後序命名為〈致關於標籤的問題〉(К вопросу о ярлыках)，但是為這題目而挑出來的資料超出了標題範圍，更確切而言，能在文章容納下這些資料的是少數。而且，這實質上看起來當然並非為反駁「標籤」本身闢謠，卻反而誹謗地加強了這些標籤。阿列克謝耶夫認為儒家的準則中，最重要的是「正名」，是矯正、修正所有歪曲和誤解。也就是說名正而言順，事實也會與之相符，但是在任何時代都不可能逃避得了歪七扭八者。因此，遵循此原則，我將試著不在文中指出所有姓名：正名，並非清算報表。

其中一個特別糾纏不休的早期標籤，就是「與當代脫離」——彷彿把自己局限在中國傳統國家裏。一九二六年的北京，阿列克謝耶夫在與駐中國的蘇聯大使加拉罕(Л. М. Карахан, 1889-1937)會談之後，滿腹委屈地寫下日記：「加拉罕重複地扯謊造謠，說我不讀低於一千年以下的文章，關於這點，我怒不可遏地反駁。」他並非毫無根據地反駁：書市上牽涉當代狀況的問題接二連三地出現，加拉罕以此猛烈抨擊阿列克謝耶夫，但根據加拉罕的自白，阿列克謝耶夫卻回應得像是從沒有人〔為這些問題〕找過他。

在阿列克謝耶夫一百週年紀念論文集，費什曼(О. Л. Фишман, 1919-1986)為彰顯其學術活動的規模和緊張程度，特地從文集中分出一塊——在《東方》(Восток)雜誌社裏的工作。阿列謝耶夫在雜誌社工作的四年期間(1922-1925)，費氏評價是「一個人當整個漢學團體來使用」：在出版的五卷《東方》雜誌中，阿列克謝耶夫就有四十四篇文章⁴，其中有十六篇專為新中國而寫。像加拉罕這種活力充沛、頭腦精明的人，未必能忽略這本「文學、學術和藝術的雜誌」中署名「阿列克謝耶夫」或「瓦·米」(В. А.)的文章，但是他依然「重複地扯謊造謠」。所以我們只好推測《東方》雜誌可能是沒送到加拉罕的手上。

阿列克謝耶夫有一位剛強、優異及熱血的擁護者，他也是孔子所謂的正名者，以導正阿列克謝耶夫及其學術遺產之名，對抗著一切荒謬的謊言，尤其是上述的「謠言」。這人便是他在戰後於大學任教時，其中的一位學生——彼得羅夫(В. В. Петров,

⁴ Фишман О. Л.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и журнал «Восток»,"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 статей к 10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 Васили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83, с. 40.

1929-1987)，現代中國文學的專家。在上述文集的一篇文章中，彼得羅夫公開地發表聲明，爲此「謠言」闢謠：「在我的年代，有一些人與阿列克謝耶夫一樣，肯定完全被吞沒的老中國，於是刻意與當代（或者照當時人們所說的『新中國』）斷絕往來，將後者從自己的興趣和學術活動中排除……索羅金 (В. Ф. Сорокин, 1927-) 在一場學術會議上的報告中，提出一些有力論證，可以駁倒這個庸俗的迷思（這些迷思卻又令人遺憾地經久不衰）：『在阿列克謝耶夫人生與著作的道路上，他無時無刻都想著當下現實的中國問題。』⁵ 當時就是這樣，而且現實的學術一開始便是這樣。以下是研究生阿列克謝耶夫在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從北京寫給奧爾金布格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1934) 的信：『我特別注意現代中國的生活……。』應該給予阿列克謝耶夫的敏銳度正面評價，他不只關注著現在的改革，還預測到中國往後發展的轉變。」⁶

彼得羅夫在文章中援引了阿列克謝耶夫的研究彙集，全照年分編排，都是有關中國當代生活、學術與文學的研究，有的已經付梓，其他則預計出版。彼得羅夫爲此本俄國作品的中文翻譯、《東方學》(*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雜誌彙編所做的註解，能夠爲阿列克謝耶夫正名，因爲彼得羅夫在精修、增補阿列克謝耶夫有關「中國當代」的文章時，他也大大增加了這些文章在學術文獻中的地位。比方說，針對胡適《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一書的評論文章，以及該論文的附錄（論文題綱「漢學危機」[Кризис синологии]），彼得羅夫補充了四十五筆註釋⁷，一如他以往所做的註釋，其中所提供的訊息未曾收錄於任何辭典，因爲這些註釋都是在茫茫大海中努力不懈才能發現查明。彼得羅夫爲整理恩師的研究成果所做的努力，艾德林將之稱爲「學術功勳」，他曾爲彼得羅夫撰著的文集《精確乃學術的詩歌：維克多·瓦西里耶維奇·彼得羅夫紀念文集》(*Точность – поэзия науки. Памяти Виктора Васильевича Петрова* [СПб., 1992]) 寫過兩篇文章，裏頭

⁵ Сорокин В. Ф. “Наследие В. М. Алексеев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б. статей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акад. Васили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Алексеева*. М., 1972, с. 103.

⁶ Петров В. В. “В. М. Алексеев о предмете,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х синолог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 29 (далее: Петров).

⁷ См.: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82, с. 355-364 (далее: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盡可能地論述彼得羅夫的功績。無庸置疑地，倘若彼得羅夫依然在世，研究新中國的這一領域必定會因為他獨到的見解而更為完善，例如他對《普希金在中國》(*Пушкин в Китае*)所做的註釋（請參閱第二冊〈翻譯問題〉[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а]一文）。

彼得羅夫的許多註釋中亦有關於生平的可信事實，例如：「阿列克謝耶夫自中國返回後，翻譯梁啟超（革新運動的領導人物之一）的書信，並於一九一〇年將譯文提供給《聖彼得堡消息報》(*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該信件已刊登於北京的報紙，……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愛國情操的決議觀點。阿列克謝耶夫為這封信寫了簡短的序文，並為這封預計發表的信件訂下標題〈中國政治展望（一位改革者的書信）〉(*Китайск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исьмо одного реформатора]*)，然而報社拒絕刊登這份會轟動一時的書信資料。」⁸

在阿列克謝耶夫晚年所撰著的《我的學術生涯》(*Опыт научно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авто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中，有這麼一段結語：

自一九一〇年起，我開始著述關於現代中國的文章，並且始終堅持不懈，然而這一系列的著作卻未能反映現實，因為多數並未出版。

阿列克謝耶夫逝世後，彼得羅夫一邊為自己的老師整理資料，一邊持續進行謄錄的工作，他帶著一股獨特的熱忱（或許可以說是歡騰的憤慨）謄錄這些文件資料。這些文件資料一一證明阿列克謝耶夫多年來留意由新中國傳入的出版書籍——所有這些新論據皆駁斥以往荒謬的標籤。彼得羅夫從一九二五年的札記《我的研究計畫》(*Проекты моих работ*)抄下阿列克謝耶夫擬定的文章標題：〈中國現代討論中的東方與西方〉(*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в китайск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從新體系看儒家文化的崩壞（陳獨秀）〉(*Из новых систем разрушения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Чэнь Ду-сю]*)、〈論新舊中國之爭〉(*О борьбе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со старым*)、〈現代中國雜誌點滴〉(*Из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журналов*)、〈現代短篇小說〉(*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овеллы*)、〈新詩與小說〉(*Новая поэзия и сяш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ая проза]*)⁹。彼得羅夫從同一本札記中，也謄錄出擬定撰著的評論文章（關於新中國漢學的探索階段）：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中

⁸ Там же, с. 432, примеч. 22. См. также: Петров, с. 29.

⁹ См.: Петров, с. 29.

國歷史研究法》。在札記中所記錄的計畫清單裏，亦評論劉芙的語法、羅振玉的研究貢獻、梁啟超談陶潛的文論、《中華大字典》，同時也評論若干現代期刊：《東方雜誌》、《國學期刊》、《歌謠》、《現代評論》¹⁰。

家中的資料裏保存了一大疊標記著「新中國系列」(Серия Новый Китай)的信封袋，裏頭裝的皆是二〇年代閱畢報告後所做的筆記：〈重評新中國的宗教與道德〉(Переоценка религии и морали в Новом Китае)、〈新中國的政治希望與悲慟〉(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дежды и ламентации Нового Китая)、〈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宣傳〉(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в Новом Китае)、〈現代中國的精神生活〉(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жизн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新中國的歷史與民族文化特色〉(Новый Китай в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等等。許多字跡密布的小紙條(革命年間的紙荒，使得阿列克謝耶夫養成節省用紙的習慣)，本是要用來撰寫新中國的相關書籍，而且在其他紙張和手記中，也早有草擬好的序言。但對阿列克謝耶夫而言，所有的東西仍只是半成品。一九三五年，基於年度匯報的需求，也有大致撰寫完成的文章：〈中國新學術：改善舊式文本研究方法與途徑之奮鬥〉(Китайская новая наука в борьбе за улучшение старых методов и подходов к тексту)、〈中國文學革命的歷史點滴：論文評家與詩人胡適〉(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оф. Ху Ши – критик и поэт)，而在隔年的報告中，則附〈論林語堂的現代中國文化概論與其自我寫照經驗〉(О новом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очерке китайск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проф. Линь Юй-тана как опыте авто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及在東方學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的演說「新中國與其代言人魯迅」(Новый Китай и Лу Синь как его выразитель)等(請參閱圖書編目1號收藏單位515與520)。

從阿列克謝耶夫每年列出難以估算的主題清單中，實可再舉出不少意義非凡的篇名。阿列克謝耶夫所列的主題清單不僅顯露他的學識淵博，也可見他亟欲傳達這些知識給同胞的心願(他將「為宣揚學術而走入普羅大眾」視爲他自己的擴張策略)。每張清單上皆條列著與新中國相關的主題，尤其首重新中國漢學。一九五〇年阿列克謝耶夫顯然爲了某期刊撰寫通俗易懂的中國古典文學概論，並以〈從孔子到魯迅的道路〉(Путь от Конфуция к Лу Сنيю)爲標題總結全文。我們可以說：在這條道

¹⁰ Там же, с. 26.

路上，阿列克謝耶夫的研究成果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阿列克謝耶夫認為入門的首要原則，便是將世界漢學的重要學術消息納入教學，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漢學。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他在迎接大學新生的導論課程「漢學家的展望」(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итаиста)中，特別預定「新中國」這個主題，並援引許多文章，這些文章構成了今日的漢學領域。

我專心留意新中國的動向。從一九二六年的旅程，我帶回許多資料，並運用於教學中。

阿列克謝耶夫在《自我寫照》(Авто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中如是說。從彼得羅夫的註釋中，我們可得知，在這些資料包括中國教學文選(共兩冊)《當代名人尺牘》(上海：文明書局，1926年)。一九二八至一九三〇年，阿列克謝耶夫採用該文選教導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восточный институт)的學生，藉此讓學生掌握書信文體，並認識中國當代的文學運動人士。在註釋中可見下列人名：李湘(音譯：Ли Сян)、梁啟超、蔡元培、馬其昶、胡懷琛、章炳麟¹¹。

阿列克謝耶夫在〈大學的漢學教學〉(Синологи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一文中，論及教學時援引中國漢學研究成果的必要性，並堅持：

為使學生每年都可以使用該年度最新的教材。……蘇聯本身在編撰中國相關的書籍時，應當同時翻譯中國和西方頂尖漢學家的著作，並附上相關的註釋，藉以培養學生用評判的態度閱讀該著作。應當提供學生最好的研究著作，諸如林語堂、胡適、高本漢(Б. Карлгрен, 1889-1978)、顧立雅(Г. Крийл, 1905-1994)、馬伯樂(А. Масперо, 1883-1945)、伯希和(П. Пеллио, 1878-1945)、沙畹(Э. Шаванн, 1865-1918)等人的著作，而且不應當將這些著作視為上層建築，或是僅為因應漢學教授的需求而採用。舉例而言，不久之前在上海出版一系列名為《中國文化史叢書》的小冊子，其中包含《中國儒家思想研究史》(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гйской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мысли)……《中國文學史》(История китаг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等書，難道這僅是為了這些教授而出版的嗎？不，應當鄭重聲明，這些翻譯的叢書在我們的大學應運用於教學，而不是在課外。此外，必須注意相較於全歐洲的「漢學」教材，中國的教學用文獻可說是遙遙領先：由顧路柏(В. Грубе, 1855-1908)所著的《中國

¹¹ С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420, примеч. 21.

文學史》儘管是歐洲最傑出的一本著作，仍無法與鄭振鐸撰著的《中國文學史》相提並論。¹²

一九二五年，阿列克謝耶夫計畫派遣列寧格勒東方活語言研究所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живых восточных языков) 的學員前往中國實習，學員皆對此興奮不已。該派遣計畫的作業之一為：

選擇一篇當代傑出作家 (梁啟超、胡適、陳獨秀) 的旅遊紀實、日誌或敘事散文作品，進行書面翻譯，篇幅為三印張。

另一為期一年的作業為：

介紹胡適 (梁啟超、陳獨秀等人) 的改革志業。

當然，所有的作業皆以白話文報紙為主題。選擇文本時建議：

依照 (一) 本身的興趣與靈感，(二) 權威人士的推薦 (或選擇梁啟超等名聲響亮者)。

阿列克謝耶夫熱心地指示前往中國實習的學員應如何選擇「先生」(сяньшэн) 及如何與之安排課程。他認為在中國實習的日子讓他徹底蛻變，並形塑出他的個人色彩，當他在書寫建議給學員時，這種個人色彩表露無遺。阿列克謝耶夫在《自我寫照》中說道：

一如我的前輩們(王西里 [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吉奧爾吉耶夫斯基 [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孟第 [Д. А. Пещуров, 1833-1913]、沙皖)，我在中國求學時也是跟隨學識淵博的傳統老師，他們也是準備國家科舉 (至 1905 年廢除) 的士子 (аспирант, 現今的博士生) 的老師。就許多方面而言，這點令人不甚滿意，因為他們對於新式的中國學術無所涉獵。

雖然令人不甚滿意，但是阿列克謝耶夫在追求新式中國科學的同時，並未忘記感謝自己的老師，而且無時無刻都謹記這些老師的教誨——這些數個世紀以來致力於八股，卻即將消逝的最後一批學者。有一份標記著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文件著實令人驚豔，阿列克謝耶夫稱之為《備忘錄》(Меморандум)，在此備忘錄中，阿列克謝耶夫極力號召盡快前往中國，以免錯失汲取這些大學者博學鴻詞的機會。想當然爾，最後的機會還是被扼殺了¹³。一九二三年，在「漢學危機」這場報告中，阿列克謝

¹² Там же, с. 186-187.

¹³ 譯者註：1917 到 1922 年這段期間，俄羅斯爆發紅白軍的國內戰爭。

耶夫再次呼籲：

舊傳統即將死去，淵博的學識經年累月精鍊出來用以學習文本的直觀方式，也即將失而不復得。一些漢學專家已大不如前，他們是資料分析與參考書籍的產物，什麼也不懂！精通語言與文化這兩者的結合已不再重要，很快地再也沒有人需要依靠古代的知識而活，任何一個學者都很清楚這意味著什麼！以後人們將一鱗半爪地學習文本。¹⁴

十年後，收錄於本書的一九三三年〈中國語言與文學的演變與革命……〉(Эволю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一文再度重申：

我們研究古中國就如同研究希臘、羅馬一樣，越來越趨於僅能透過一些書籍和零星的資料。

然而，阿列克謝耶夫對於古中國漢學的態度不一，甚至自相矛盾。艾德林在《東方學》的後序中談到：「阿列克謝耶夫對過度熱衷於『活傳統』的警告並不無道理（某些程度上有些突然）……『活傳統』的角色如同樂譜之於樂器，然而它卻因為時常被某些人過度執著而有其局限性¹⁵。」¹⁶阿列克謝耶夫遵循並相信：「一名漢學家最大的成就在於充分掌握文本和其中現象（這時常並非遙不可及），並進入中國思想的最深處，這較綜合評論及學術上的概論要來得重要……但這對研究中國歷史而言並不簡單，對研究中國文學可就更加困難……。」¹⁷阿列克謝耶夫的論點如同艾德林所認知的：「不單僅是熟悉文本，還須達到理解的最高境界——對文本的美學分析。」¹⁸

關於這種美學分析，在阿列克謝耶夫的中文日記(1912)中如此推崇，例如：

與和尚一起離群索居並讀經（佛經），令人感到愉快無比。

但也如此說明：

〔這對〕文本的理解全然沒有占到任何上風……因為對我而言，當時所有不

¹⁴ Там же, с. 364.

¹⁵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Возражения О. О. Розенбергу на его магистерском диспуте. . .,”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352.

¹⁶ Эйдлиן Л. З. “Алексеев и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Там же, с. 450 (далее: Эйдлиן).

¹⁷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Замечания на книгу-диссертацию Ю. К. Щуцкого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Там же, с. 374.

¹⁸ Эйдлиן, с. 452.

懂的事物也僅是以一種迂迴的譬喻來表述之，而非加以闡釋。我並不指望在中國和尚中找到一位教師來研究文本。我不過是與他們一同打坐，並試圖進步到他對文本的直通理解。

直通理解之樂，就在於美學分析或是以正確方法對待文本：

然而這一要求卻無法繼續走下去，因為〔這樣的〕理論或許只能建立在獨立活動並純粹研習文本這樣的方法上，而沒有任何教師。

於是便和「先生們」一起閱讀文本，儘管這些老師中不乏飽學之士（非僅是博覽群書的書呆子）。阿列克謝耶夫曾與劉大汭先生及中東鐵路附屬中俄學堂（阿列克謝耶夫在此教授俄語）的一位學生進行一場有趣的實驗：將萊蒙托夫的〈棕樹三株〉（Три пальмы）譯為文言文。這不僅要求高度掌握文言文，還需要一定的文學造詣。阿列克謝耶夫在日記中談到，大家都對這項實驗感到著迷，尤其是那些飽讀詩書的學者及詩人，例如他曾提到的劉大汭先生，不過他在日記做了以下評論：

我對劉兄之解釋不甚滿意，其解釋流於生硬淺薄，遠非我心之所嚮。然而他終日為我案牘勞形，工作至半夜兩點，使我不勝感激。¹⁹

阿列克謝耶夫對舊中國漢學的態度是一項值得討論的議題。儘管如此，他對新漢學的態度更是我們所不可忽略的部分。重要的不僅如此，一名出身於舊學派的學者在其學術生涯之初，即對漢學表現出極大的熱衷，無分新舊學派，後來更進入了世界漢學的殿堂。在阿列克謝耶夫的學術生涯中，與「活傳統載體」²⁰的實際交流使他切切實實地體會到中國的「文化深度」，這是他終其一生孜孜矻矻所追求的目標，然而這個目標也使他感到困擾，因為有太多問題的解答並不見於書卷當中。

阿列克謝耶夫從不否認他所抱持的信念：在他的身上時常可見到舊中國的影子，但這不影響他對中國翻天覆地之劇變的觀察，他總能避免遽下結論（他是如此緊握浮標而不使潮流將他沖往任何一方）。他曾在晚年提起這段歷程：

我活在且活過舊中國之頹傾，親見新中國之肇興；我對舊中國及其一切價值了然於胸，然對新中國亦能持客觀之態度，這就是中國歷史教我的知識。²¹

¹⁹ 目錄三之檔案室編號 820（保存阿列克謝耶夫所有的中文信函）收錄了阿列克謝耶夫與劉大汭四封書信。以下引用之其與中國人的通信，皆不在附註檔案室編號與目錄編碼。

²⁰ 譯者註：中國人民。

²¹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китаиста.”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307.

四〇年代末期，阿列克謝耶夫曾有一次朝向院子說了這番話。自然地，他不能站起身²²來弄清楚他意指的是哪一段歷史；是那些在紀事中的，還是在他眼前發生過的。在他的文字中，回答了那些擅長叫喊「萬歲」的人，爲此不需要特別的知識，故也無須將標籤貼在摒棄這種活動的人身上。

阿列克謝耶夫親眼見到的歷史，在他的日記中如實呈現，宛如紀錄片的膠卷。他的日記儘管不甚連貫，但仍幫助我們理解並體會中國歷史事件本身的複雜。身爲一名著迷於舊中國的學者，但同時又因自己新派的本質而不能不感受中國的新思潮，這樣的雙重特質正是他之所以得以保持客觀超然的原因。

阿列克謝耶夫曾遍遊大江南北（1907年遊北方，1909年遊東方，1912年遊南方），旅居期間，他看過浩瀚無際的大洋，也觀察了數百萬計無文化的百姓。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地試圖理解以下現象：無所不在的銘文石碑（儘管多數百姓並無識字能力，無法讀懂碑文，但是卻對碑文大致內容略知一二），是中國人對自己文字藝術、典籍癡迷的象徵，是他們對教育和斯文崇敬的表現，然而這一切卻又和他們對歷史文物近乎冷血的態度並存（任憑歷史文物日漸崩壞於古刹的荒煙蔓草之中）。

我住在神州，潛心研究中國是我的志業，故又赴蘇州。然而，面對此處種種現象，舉凡生活精神及其顯現與意義，就好像霧裏觀花，實在不能理解呀！一九〇九年阿列克謝耶夫的日記是如上這般描述，但隨後又帶著痛苦的回憶：

人生百態，令人費解至極。我自認爲是個成熟的漢學家，至一九〇九年爲止，我研究中國已經十年，如今最簡單之現象仍未能理出頭緒，所知極少……無人能爲我解惑……，如今千頭萬緒，不知長居此地能否有所長進？傳教士畢生定居中國，然其所寫的東西，與孩提之言沒有差別。

阿列克謝耶夫既是漢學家，亦是史家，二者角色密不可分；他也關注在他生活周遭的中國民族問題，以下是他對哈爾濱的看法：

〔中俄〕二族雜居，彼此素無了解，亦無了解之動機。

哈爾濱如此，漢口亦然：

此處乃俄國商賈麇集之地……，大多數是沒有文化素養的人，終日搬弄是非，巧言令色，胸無點墨，無人有求知欲去探求自己所居住的國家……，三四年後，他們將散盡財物，並因酒醉而死……此等生活粗鄙至極。

²² 譯者註：阿列克謝耶夫當時已經罹患癌症，重病不能站立。

但是就在一九〇九年他要前往漢口這一個「江畔大城」的途中，一個短暫的插曲使他感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親近，這段「北京—漢口」之旅是這樣的：

夜間一名中國人進入包廂，當時天色已暗。我們隨意交談起來，此人甚是有趣，為普通平頭百姓，普通到沒有必要一探其身家職業。我們所談無非就是日常生活之事，然相談甚為投機，如此暢快坦率乃過去所鮮有……等到火車抵漢口，是相互道別的時候，然而這位先生居然沒有邀我去他家（煞是可恨！），我因而未能寄住於這位先生榻下。

渴望對四周環境及生活多所了解乃文化素養的根本，知識分子多以此法嗅出彼此，不論對方的國籍及背景為何（索忍尼辛的小說《地獄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如狗一般嗅著。」[*чуют как собаки*])。藉著和中國知識分子的交流，阿列克謝耶夫得以了解中國文化，乃至於知識分子神祕的一面。

一九一二年夏天，阿列克謝耶夫被俄羅斯中亞暨東亞研究委員會(РКИСВА)及人類學暨民族學博物館(МАЭ)派遣至中國南方沿海地區：上海、廈門、汕頭、福州、廣州²³。這次派遣的主要目的是要採購文物及書籍，以豐富博物館及大學圖書館的館藏。他所購得之經典、詩集及史料悉數使用於他親自講授的各年級中國文學課上，這些東西至今仍被使用著。儘管阿列克謝耶夫被授予的任務與政治毫無關係，他還是在福州、廣東一帶蒐羅了關於中國第一次革命的傳單及海報等印刷品（這些資料於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的中國革命史展上被展示。然而令阿列克謝耶夫沮喪的是各式革命黨人的報刊，後來整批不翼而飛）。後來在出差工作簡報上，阿列克謝耶夫坦承自己此次任務未盡如人意之處：

當時中國政治局勢詭譎，因此未有足夠時間及心力仔細審視此番所獲之品項。

然而在阿列克謝耶夫的日記裏，及他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在地理學會(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講座中所作的歷史回顧，內容不僅止於歷史事件本身，還帶著時代的顏色與氣味：

上海。華人已除去辮髮，全都披頭散髮……人心浮動，四處瀰漫求新求變的

²³ Баньковская М.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миссия китаиста в 1912 г. (от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 .). Книга приморский (4 мая 19 — августа 1912),” *Кунсткамера.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тетради*. СПб., 1994, вып. 5-6, с. 330-341.

風氣。人人都崇慕歐洲、日本之習尚，庸俗之處也都照單全收，同時鄙夷中華舊習（尤以青年為甚）……書市充斥新潮書籍，其內容多以革命、民主及反清反舊為大宗。為了取得中國經典書籍，我不得不轉赴南京……美國人欲藉宗教使革命青年依附其卵翼之下，使之具國際化之特徵……一切如此現象皆見於無知且散漫之群眾中。革命本身充塞盲從庸俗的特性。

在開往普陀山的渡船上，阿列克謝耶夫注意到兩個有趣的人，顯然他們兩位彼此認識，其中一名是社會黨²⁴的上海市黨部主委（我確信他主持的業務是對外國志願人員的監視及策劃暗殺行動），另一位則是普陀山的僧人（將圓形小毯鋪在人來人往的甲板上，然後誦起經來）。

此二人顯然互相為敵，然卻比鄰而坐，令人費解……該社會主義刺客贊同以開水摻紅酒，我們遂悉聽尊便。

對於一切發生之現象，阿列克謝耶夫大學時期的好友，旅居上海多年的沃茲涅先斯基（А. Н.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1881-1937）亦無從解釋起。據阿列克謝耶夫本人所言，他這位朋友「其所言，了無新意，然由此可知，無人得以了解此處局勢」。

阿列克謝耶夫與沃茲涅先斯基一同接受黃興的招待——「中華民國繼孫文之後第二位國父」。

我們在富麗堂皇的會客室裏等待了許久。來了一位中國人，他有些手指被截掉了，身上散發出碘酒的氣味。我好不容易才與他搭上話，向他詢問同盟會的事。同盟會其實是支持政府的，而不是反政府的組織。我們的這段對話，總體而言，意義不大。沃茲涅先斯基曾要我把這段對話記錄下來，但我拒絕了。

以上描述的這段小小情景，顯示阿列克謝耶夫覺得自己在政治圈是個局外人；這些人不是他的夥伴，這個圈子不是他的領域（我不禁回想起，我在坐火車前往漢口的夜裏，曾在黑暗中與看不見的陌生人對話……）。

在民族學出訪團中，當然不能妄想要與中國當代各種事情的處境熟稔交好，但我自己有時又常常去參加一些聚會。

阿列克謝耶夫在自己的報告中如此寫道。民族學出訪團的目的不僅是要替人類學暨民族學博物館採購，觀察不同的宗教文化，同時就像之前曾提過的，還要蒐集書

²⁴ 中國社會黨於 1911 年由江亢虎成立，於 1913 年解散。

籍，以提供給大學當教材及充實自己的藏書。購書最豐富的一次是在上海——商務印書館 (Commercial Press) 與掃葉山房 (Сае шаньфан)，不過阿列克謝耶夫仍翻遍了所有的書店，也在街上的舊書攤的書堆中翻找。在這裏，他感覺自己如入自己的詩境、〔怡然自得〕：

在熙來攘往的街上販賣的文學作品，是如此地有趣，我總是貪婪地在舊書堆中翻找有價值的東西，完完全全地心無旁騖。

他被「民間文學的榜樣」深深吸引，例如：勸人戒掉鴉片或是剪去辮子的韻律詩等等新潮 (up to date'ы)²⁵，但他從不經過暢銷出版品的書鋪——包括黃興和孫文的傳記、《革命者教義問答》(Катехизиса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²⁶，及盡是以所謂「中國的覺醒」(Awakening of China) 為題的訪談，這些雜誌的訪談反映「歐洲機械進步帶來的壓力，翻譯文學的影響和國家延攬外國人才」。

阿列克謝耶夫到處都看到這些壓力和影響，他把問題釐清，並在日記裏記載了身為事件目擊者的反駁：

國民黨人很想發外國人的財：人民對生活不滿而只是無聲地埋怨。米價高昂，窮者和盜賊非常多。人民冒著被罰的風險吸食鴉片，沒有敲詐者的話，當然也不會走到這個地步……中國人無法擺脫貧窮的困境，外債有一半都用在軍事上……傳教士提供起義所需的武器，且傳教士的學生也使用暴力。

在福州，阿列克謝耶夫首次看到革命期間被破壞殆盡的廟宇：

東嶽廟。破壞文物的行爲：碑帖被焚毀，神像被打碎，牆上的題詞被摘下，壁畫被丟進大煮鍋裏。這都是學生聯盟 (Союз учащихся) 做出來的，沒有人敢挺身維護。倘若所有被破壞的東西真的都屬於宗教，難道真的沒有人要維護嗎？這個國家很特殊，而未來也會很特殊。

另一個革命的例子：

廣州。革命之火正熾熱燃燒。路上交談的人無一不剪去了辮子，雜誌裏盡是擊潰舊習，與宗教對抗的言論。

阿列克謝耶夫在廣東爲了找到熟諳北京方言的嚮導，向俄羅斯領事館尋求協助。他

²⁵ 譯者註：此爲英文片語加上俄語複數結尾的形式，屬於作者自創風格，並非俄語正規用法。

²⁶ 阿列克謝耶夫在此大概是寫鄒容 (1885-1905) 的《革命軍》(1903)。這本書曾重刷多次，並獲得廣大的社會迴響 (銷售超過一百萬本)，書的內容是講述「推翻清朝，以建民國」的必要性。

的遭遇如下：

領事白列晨科 (А. Т. Бельченко, 1873-1958) 是位漢學家，行事果斷……他憎恨中國人與其革命：他們全是不折不扣的惡棍歹徒（但他卻很樂意來此地任職）。完全不能領會且掌握用我允許雙重解釋的語言來就事論事，把我惹怒到抓狂的地步。

阿列克謝耶夫自己的個性或許也可稱為粗暴。自尊心強、器量狹小的他，有異常急躁的性格，這常常使他人不滿，也容易讓別人替他貼上標籤。雖然他常常脫口說出尖銳的見解（對此他總是很快就後悔，責難自己，並總是準備好要道歉），他仍相信自己的道德修養——身為人和學者的道德修養。對學者而言，所謂學術客觀就是種公正感，因為阿列克謝耶夫的心沒有分成兩半。屬於這類的人也會受到他的敬重，阿列克謝耶夫最喜歡的其中一位學生舒茨基 (Ю. К. Щуцкий, 1897-1938) 便是這樣的人。舒茨基受阿列克謝耶夫之邀寫下了《傳記》(*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這是關於他最重要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的書籍，舒茨基為他的性格下了一個簡短且具說服力的定義：「在我為了選擇中國或是印度而猶豫不決時，您內在性格的典範便使我做下決定——那是貫徹始終的人所顯現的典範……。」²⁷

對此，過了多年以後，在舒茨基下一輩的另一位學者艾德林也這麼說：「對阿列克謝耶夫而言，善與惡並不是實用主義般地存在，也不會僅為一己之故而採用善惡（我們會想起施華爾茨 [Е. Л. Щварц, 1896-1958] 有名的笑話：『唯有那些待我好的人，我才會將他們稱為知識分子。』阿列克謝耶夫甚至都不曾講過這個笑話）。善與惡的存在對阿列克謝耶夫而言，是一種常識且全然清楚明確。」²⁸ 我並非引用來論斷阿列克謝耶夫是否無法仿效施華爾茨的犀利——不言而喻，那自然是一個笑話而已。關於這項道德特徵，艾德林的觀點是對的；即使阿列克謝耶夫喜好用有趣的字眼、謬論或誇張的言詞，但他也不會違背這項道德特徵。他有這樣天生的修養，從中學到大學時期維持至今。可以看到在談到奧爾金布格，並稱呼他為學者中培養學者的教育家（有一種看法，他當然是在說他自己）時，阿列克謝耶夫特別點出他自己優點中的厭惡面：

強烈分明又普遍的特性，而特別是橫掃千軍、勢不可擋的論斷（據他的表達

²⁷ Щуцкий Ю. К.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перемен»*. М., 1993, с. 57.

²⁸ Эйшлин Л. З. “Чему учиться у Алексева,”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 12.

方式：sweeping statements），且近乎不肯妥協又偏執的態度。²⁹

正因如此，可以理解阿列克謝耶夫無法容忍廣州領事對「中國人與其革命」的態度。然而在革命期間，中國報刊裏卻充斥著「橫掃千軍、勢不可擋的論斷」，這激起阿列克謝耶夫不小的憤怒（如果不是狂怒）。

在一九一二年的旅行後，阿列克謝耶夫有很長一段時間（直到1926年）都無法再訪中國，這使他既氣惱又擔憂；無法去自己所研究的國家，他認為對學術工作是有害的。除了工作外，他在夜晚酒醉時，翻譯並研究司空圖的詩作外——這個工作被歷史本身的局勢阻撓，宛若他碩士論文的答辯也在一九一六年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緊接著的十月革命所阻礙。若看到上述的《備忘錄》（1917年10月）這類文件時，阿列克謝耶夫會感到驚訝又困惑，而對於那些對周遭事件表現出相對冷漠的人，他也會感到憤慨，但這個開創者最難以抹滅的，是在任何阻礙下都能致力於事業的阿基米德精神，即使是在沙上也能作畫。

在後革命時期的幾年，阿列克謝耶夫爲了來自中國的報紙雜誌只剩零星的幾份而埋怨憤怒後，他終究從中取得關於中國時事的資訊。他覺得將中國發生的事件告訴大眾是自己的責任，縱使他通常都確信社會大眾對中國興趣缺缺——他還是準備好要告訴任何聽眾，只求徵得他們的同意了。這裏舉個顯著的例子：世界文學出版社（Всеми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的公用信封裏裝了一疊題爲「現代中國的精神生活」的報告，這個報告隨後在不同地方被以下聽眾聽過（信封是阿列克謝耶夫親筆寫的）：（一）文學家研究所（Дом литераторов）（1921年6月3日），（二）盧加政治教育機關（Луга. Политпросвет）（1921年6月21-22日），（三）東方活語言研究所（ИЖВяз）（主要課程是「中國文化」[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1924年春），（四）烏申斯基教育職業學校（Педтехникум им. Ушинского）（內容替換爲：「新中國的教育問題」[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Нового Китая]，1924年11月20日）。除此之外（已經在信封上指出），報告中的一部分（語言改革）被用於文章〈中國的字與新語言〉（Алфавит и новый язык Китая），本來要賣給《東方》雜誌，但到最後被拒絕了。

令人驚訝的是，所有這些被放入標註「新中國系列」信封的一大堆資料，都大膽回應了當下發生的事件，這是二〇年代。三〇年代像這樣的情形卻也仍令人覺得難以想像。終究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一場慶祝無產階級革命十八周年的會議上，

²⁹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20.

阿列克謝耶夫作了一場題為「革命、戰爭與庸俗」(Революция, война и пошлость)的演講，可以說他就像是要在鋼索上維持平衡似的。在當中，他帶著必要，但是又不熟練、不精巧的附帶條件加以解釋說明敘述：

革命的卡德利爾雙雙對對舞(кадриль)，第一個人起步，接著後面就一個接一個地追隨投機者的權威——中國「將軍」，那是一群野心勃勃的初學者，好不容易才從歐洲與日本的軍校畢業。

在二〇年代時，他就直接了當且不帶附帶條件地談過這種「卡德利爾雙雙對對舞」。我在此提出幾點評價：其顯而易見的矛盾，正是事件本身矛盾所造成的結果。因此，阿列克謝耶夫通常在談具雙重解釋的事物時，會避免「橫掃千軍，勢不可擋的論斷」，但有時也有當頭痛擊。從「新中國系列」(1922)，我們看到：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宣傳」。稚氣未脫的社會主義、興奮過度的社會主義，天真幼稚和胡言亂語，一切都使人感到噁心頭痛。隨之而來的外來文字，還要特別注意其承載的外來思想。小小字體印出異議，自己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強盜的心理處處都如出一轍……社會愚民的群眾支持，大家都不敢評論彼此。大聲口號及掠奪的競賽，顯示他們的心中已沒有良善……新舊之間出現了貪婪的爭執。新的終將向舊的致敬。

以上對紅衛兵崛起的氣憤駁斥，也預言了他們未來的發展。阿列克謝耶夫雖沒有活到「文化大革命」，也不曾預言它的發生，他當時卻已開始擔憂，不過他相信一切都會回到過去，也就是回歸到積累數千年的文化。由此可見他是個先知。

請大家聯想：不久前有一大批書籍從中國運至彼得堡大學，致贈了六百二十冊精美的出版品給中國研究室。附有註釋的白話經典（這不就讓人想起阿列克謝耶夫的預言「新中國終將要向舊中國致敬」？！）、大辭典、百科全書、指南……若是阿列克謝耶夫看到如此豐富的寶藏，他的臉上會閃耀著怎麼樣的光芒呀！我想他是有功勞的，他對參考文獻的熱情源源不絕，他還將這些文獻送給教授語文系的自家學生（無庸置疑，此處首要是指彼得羅夫），這些文獻也都成為列寧格勒（彼得堡）漢學學派的特殊標記。

不過且回到二〇年代。在預計出版的《新中國》(Новый Китай)可以讀到這樣的結論初稿：

口號：破壞所有舊事物！而誰會來收拾一切？十足的布爾什維克政策：將所有過去的事物化為謾罵的字眼，並因此沾沾自喜。打倒孔夫子、老子、佛祖

這些偉人之後，最後才可以看見小人物們，但他們也打倒了所有神像，這個「位置」被架空了，但人被放置於框架之外，並開始攻擊框架內的一切。團體的個人——不爭的事實。這些破壞者在這波「破壞式的創造」什麼都沒得到，他們只會仿效他人，同時又爭先恐後地從事需要意志、智慧的激烈活動。人類進步的複雜機制正在崩解，因為思想全落入這些不成熟又不學無術的人手中。「天使的叛變」(Восстание ангелов)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這些天使的智力皆不健全……。

與我們不同。中國布爾什維克黨，這些人不是在咖啡館中接受教育，而是在大學裏……行事聰明，不是像很會爭吵但說不出個所以然的革命能手……。迥異的途徑。中國這國家改變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糧食。它用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無法計量的瑰寶。在舊有事物鋪上一層。不是完全撤去舊有。

中國的展望。舊系統當然註定滅亡，但是不是隨意地拋棄。中國的知識財產已近四千年。知識分子階級……對知識的愛好……。

阿列克謝耶夫了解並且相當重視中國知識分子對知識的愛好，無論是在比較年長的中國舊識，或在「新中國人」中都能發現。

必須要迎接這個會思考的知識新中國……只有學術、文學、藝術能夠聚集人心——而不是政治。

當然在這個年代之中，「知識」二字聽起來刺耳，這樣的宗旨就很難不被貼上「抵制政治」的標籤。但這樣的標籤不足以激怒阿列克謝耶夫，而使他「脫離當代」，在這「當代」中，他看到了知己知彼的絕對必要：

俄國不只要了解舊中國，還得熟悉新中國。國際現況，其課題是要讓彼此親近，而非讓自己失去特色……了解新中國、新的生活形態，這才是使各民族人民親近的長遠課題。

在這樣的題綱下，若是高呼求助，不管怎樣都不會被聽到的，「我無法到中國去動心靈手術」。阿列克謝耶夫這裏提的「心靈手術」，在當時正在寫的文章〈俄羅斯與中國〉(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現只保存其草稿)中，也有類似的敘述：

中國學者開始客觀地研究自己的國家。我周遭也有從事學術研究的中國同行，他們能夠解決許多問題，我們因為志同道合而結合，一同投入需要節奏與精力的公眾活動中。這項課題，是我們不敢避開的。

會有這樣的狂熱呼喚，是因為當時不僅無法訪中，更因為在彼此交流的路上充滿了

令人懊惱的障礙。阿列克謝耶夫總是能深刻地感受到這種障礙——中國和歐洲漢學家兩方都自視甚高。在以上提過的「漢學危機」中，阿列克謝耶夫引用了胡適的一段話：「我感到很訝異，原本想這個外國人，未必能夠讀一般的漢語文章，但他竟然拿了莊子的文章來讀。」阿列克謝耶夫毫不隱藏自己嘲諷作者的自溢，也點出東西方學者從以前到現在造成隔閡的理由：

新中國學者，終於知道歐洲人以前與現在怎麼描述中國，並對歐洲在研究漢學時具有批判的才能感到相當驚訝。在領會歐洲學者的研究方法後，中國學者開始弄明白，開始完全用歐洲的科研方式來做研究，於是乎……對於後者而言，是一種危機逼近。³⁰

要對抗這一危機，阿列克謝耶夫認為至少要消除學術中任何分離主義的現象，特別要減少獲取的學術資訊中不了解的部分：

亞洲博物館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中根本沒有新中國的檔案室。所以，意外獲得的新雜誌就算匆匆一讀，都能獲悉至今從沒見過的中國事件，中國學者在研究自己國家時納入了這些事件，不過這一次沒有幾世紀以來的崇敬，而是一同展開中國學研究。³¹

因此阿列克謝耶夫決定了一項重要的活動志向——恢復圖書交換。這項活動顯著地記錄在他的日記中，尤其是從一九二六年起，他參加了同為中國專家的蒙古學友人符拉基米爾佐夫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 籌劃的民族語言學參訪。他們坐特快車從西伯利亞經過蒙古到北京，然後開始一個半月緊張忙碌又充滿感觸的學術工作，接著到上海乘船，最後到歐洲的馬賽 (Марсель)。

中國的政治局勢不但複雜，有時也讓從紅色俄羅斯 (Красная Россия) 來到中國的旅程變得危險。阿列克謝耶夫頭一次感受到他人對自己的戒備態度，在一九二六年的日記中，他這麼寫道：

報紙上有一則新聞：有三名被認為是紅色思想的報紙工作者被槍決。因此我明白，為何他們對我們如此避之唯恐不及。

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迴避他，他找到許多無畏的聯絡人，因此他的筆記本裏寫滿了地址，都是可供書籍交換的。

³⁰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361.

³¹ Там же, с. 202.

對此事最真摯熱誠的人，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袁同禮教授³²：

袁同禮雖拘謹，但他積極且盛情地向我們展示《新元書》，是梁啟超評注的龐大書籍，這也是我正在讀，並將之翻譯成英文且加以討論的……然後我向袁教授提出極多問題，也得到很多回答與指教，這些對我都相當特別……我貪婪地提問，也貪婪地記錄……感到無比興奮。

袁同禮的態度並非例外。中國學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音樂作品文獻部門 (Отделение песенных записей) 的主任仍建議阿列克謝耶夫能「投稿，必定有其好處」，儘管從官方那取得的資源不多。在首都博物館 (Столичный музей) 裏，阿列克謝耶夫的友人邱山南 (音譯：Цю Шань-нань) 協助他評述眾多資料，也與他談論學術支持的難處等事。

雙方關係的拉近不僅在各機構內進行，他也在宴會中進行這項任務，也就是「記錄」，從以下的例子可以得知：

在袁同禮處聚餐：歷史學家馬衡³³、年輕的歷史批評家顧頡剛、身為地質學家的袁同禮哥哥³⁴。兩位研究元朝歷史的歷史學家……我興奮但毫無把握地談論了胡適、新中國與通用象形文字等等，我得到虛偽的稱讚，卻沒有人答話，也沒人一同爭論。餐點準備得很棒，但是我幾乎沒吃，主人也觀察到這點。飯後客人們在院子中開著露天會議。我做出攻擊，卻也沒人反駁，因為這些年輕的學者並不了解我們是何人，還有我們要的是什麼。拉近雙方關係的工作展開了，但是能成功破冰嗎？顯然，我必須按另一種方式行動：生活在這裏，讀他們的書，做使他們感興趣的工作。

在另一場例行餐會後，他又寫道：

我充滿熱情地赴會並且說了很多。這樣的晚宴不應該不定期地舉行，而是要有計畫地長期舉行——我的參訪因此稍顯不足。

這種不足即是爲了打破中國學者對歐洲學者的長久戒備（這種戒備比所謂的政治恐懼成分還要來得深）。在有關「漢學危機」的報告中（上文曾援引），阿列克謝耶夫

³² 袁同禮和阿列克謝耶夫通過無數封書信（六十八封信件與兩張明信片，全由英文寫成），其中有些由中國通信人轉交給阿列克謝耶夫。

³³ 在檔案室內有三封馬衡的信件，他是北京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³⁴ 譯者註：袁同禮的二哥袁復禮。

寫下他這個身在中國的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模糊印象，寫下很難翻譯的字詞：「湊熱鬧。」（無緣無故地看熱鬧，不了解也不參與）要破冰只能反向操作——以自身的專業及誠摯的志向和新中國漢學家交流。

在長江大學（在阿列克謝耶夫的日記中，對這所大學沒有太好的評價：「只是個傳教的窩巢。」），阿列克謝耶夫在聽完王國維的英語演講後，他也用英文討論東西方文化團結的議題，並且也受邀主持下一場演講，主題任選。

在音韻學家趙元任（「謙虛的得獎青年」）的處所內，我們談到中文聲調理論及國語。中國音韻學家邀請這位俄羅斯人一同用餐，並且過程出乎意料地愉快，這在日記中有記錄。一切都很有趣，而最重要的是——他們也說好要投報³⁵。

在一陣慌亂中，來到北京的炎熱日子裏，必須要處理許多事，阿列克謝耶夫最沮喪的，就是來不及見到許多他盼望建立起關係的學者，其中包括語言學家黎錦熙——《國語辭典》的作者³⁶。最後，最不走運的是胡適剛好不在中國，胡適是他最想要認識的人物，他聽過很多關於胡適責任感十足的故事。

不只改革者使阿列克謝耶夫心生嚮往。在一個典型的中國翰林學究（嚴肅的老學者、收藏家）家中，他們談到了新舊問題，說道：「人的淵博學識與智慧有兩個根本：必須有『德』。」阿列克謝耶夫把這個儒家的專有名詞譯為「完善的道德品行」，並且視其為（寫在〈墮落退化的與革命進化的中國文化〉一文中）「所有學習儒家者，志在反對卑鄙下流與罪孽深重的庸俗」。

阿列克謝耶夫在北京的交友圈不單只有學者，有三個來自「流浪犬」（Бродячая собака）團體的貧困文學家（極左派的代表）也到旅館找過他，並帶來許多自己的文章³⁷：

喝茶後，我們就談論俄國文學與新中國，他們總是高喊：「廢除舊劇院！靠向歐洲戲劇！」等口號，而我只有倒茶時才會出於禮節地起身。³⁸

³⁵ 趙元任的書信只保存一封（以英文寫成），內容與教學材料有關。

³⁶ 現保存黎錦熙的一封信和一張明信片，信的內容談論中國文字的拉丁化。

³⁷ 阿列克謝耶夫翻譯「狂飆社」時，玩笑地將之與彼得堡一家著名的夜總會「流浪犬」（1912-1915）作連結，因為「狂」字取自於「狂徒」一詞，而「飆」字由「風」部與三個「犬」組成。狂飆社創立於1926年10月，由魯迅學生高歌和文學家向培良等人創立，該社出版《狂飆週刊》與一系列的書籍（詩歌、小說、札記、理論研究），但很快就解散了。

³⁸ 阿列克謝耶夫在筆記中並沒有提及這三位文學家的名字，但在他的檔案資料庫內有1926年來自

在日記中，他也常常提到施時常先生（音譯：Ши Ши-чан）和藝術家張浩如（音譯：Чжан Хао-жу）³⁹。施先生時常與阿列克謝耶夫一同停留在書攤和人民劇院裏，莊先生則協助他取得書籍、民間畫作與信紙。然而即使與他們的關係如此友好，阿列克謝耶夫隨著時間的流逝，還是頗有微詞。「親愛且卓越的施先生」拒絕讓外國人進到家裏欣賞皮影戲：「當下這狀況……間諜實在是太多了……。」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反應，這自然是無論何時都會發生的事，但在政治動盪的時刻，這差別就愈加明顯了。以阿列克謝耶夫在日記中寫下的北京小插曲為證：阿列克謝耶夫的嚮導中有一位是他的老友——實習多年的童振宇先生（音譯：Тун Чжэнь-Юй），兩人在阿列克謝耶夫抵達的第一天便順利相逢（在童先生保存的相片上，阿列克謝耶夫親筆題上「認真負責、思緒清晰、舉止紳士的劇院行家」）⁴⁰。隨後就在旅途中與天津道別（坐渡輪到上海）：

有位穿著歐服的中國人坐在車廂，他聽到我和童先生有說有笑，就對我感到一陣厭惡。

雖然時常會感受到這種人情冷暖，但大抵來說都還算溫暖。阿列克謝耶夫在記事本中寫下十七位中國人名，這些人可以像朋友般依靠。其中有幾人特別被提到，他們願意協助寄送書籍，並加以重贖。例如說，有個叫作宋傳（音譯：Сунь Чжуан）的人：「客氣又學識淵博的北京人，侃侃而談。」有趣的是，阿列克謝耶夫在記下對新中國朋友的印象時，都會提到「侃侃而談」，或是「說得不錯但未臻完美」。和這些中國知識分子的談話，他們操的標準語總是讓人很快產生聯想，這常帶給阿列克謝耶夫極大的喜悅。他就像個美食評論般津津有味地談到這些對談。無庸置疑，以這種方式評價優點的才能真正是中國人固有的；不管是舊中國人，還是新中國人。總之，雙方建立起互相都滿意的積極互動。

在北京的諸多會晤中，赴蘇俄大使館三次拜會全權大使加拉罕，特別重要。在偌大的大使館中，阿列克謝耶夫先在俄羅斯特命公使科羅斯托韋茨（И. Я. Коростовец, 1862-1933）保留昔日擺設的會客室（阿列克謝耶夫對此會客室有些印象）等了一會，隨後由兩名健壯的年輕人帶著阿列克謝耶夫，他們好奇打量著他，打開一扇扇深鎖

北京的信件，上頭有高歌、段復生和向培良的簽名。從信中可以得知，他們三人是從魯迅那得知阿列克謝耶夫到訪中國。

³⁹ 與張浩如（維漢 Вэй-хань）共有五封信。

⁴⁰ 童振宇的書信共保存六封。

的門，最後進到漆黑的辦公室。加拉罕和藹地迎接後，便提出一連串問題，同時在筆記本上寫下回答，並在阿列克謝耶夫要起立鞠躬時打住他。這次的會談，如同日記所載，〔關心的是〕胡適與從各方面來說所有的新中國學術活動。這對我們不僅是客體，更是了解中國人根源的主體。三個小時完全不夠用，之後又有兩次會談，三次會談共計九小時。

阿列克謝耶夫在第一次的拜訪行程中，聽到關於自己脫離當代的「瞎話」，這讓他相當氣憤。加拉罕公然引述他人欲給阿列克謝耶夫貼標籤的言論，好讓這個標籤能解釋自己欲簡化研究中國的途徑，這些人認為在動盪不安的時代，不需要傳統文化的知識以分析中國當代，也無須考究古代，而加拉罕也贊同這樣的觀點。阿列克謝耶夫在題有「加拉罕談論漢學問題」(Карахан о задачах синологии)的信封裏，放著他對某報調查的回答：

漢學家們（有些例外）不認為值得涉及不存在於時代中的事物……由於有些中國學家的缺失，我們不了解正在受苦的人民，與他肩並肩地生存，還能夠帶給他們命運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依然不能允許自己走出逝去的過往。

阿列克謝耶夫不去反駁顯然已成定調的事實，而是做了實質說明：任何的中國研究都需要漢學基礎，因為就算是超越中國傳統儒學和史學的先鋒都必須知道自己超越了什麼。

阿列克謝耶夫將自己對加拉罕的印象寫入日記，並直言：

敏捷剛毅，但思緒輕浮。了解事物的機敏和才能非常傑出，卻無法從壓在他心頭令人難受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尤其是對外來的青年人，沒有一處令他滿意。

阿列克謝耶夫對於這一類人的整體性格記錄在之後的記錄文章〈論中國語言的人文教育〉(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⁴¹，這篇文章汲取了作者與加拉罕的許多會談內容。到北京前，阿列克謝耶夫曾在哈爾濱結識了許多彼得堡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的畢業生，他們有些人很快就改學西方的方式，忘記在大學學到的一切，撰寫非常少量的學術作品。阿列克謝耶夫不希望離開學術的任務與問題，所以當他看到這些大學教育的代表對政府有益，也能服務自己的機構時，他並沒有加以譴責，而是認為這總比他們適合國外代表來得好，甚至在許多情況下都來得更

⁴¹ См.: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с. 163-174.

好，不過在他們之中也是有些「東方學者很快用行家的自以為是代替初始的驚慌失措」⁴²。這表示除了一些人以外，有些人不關心東方學及其教學的整體需求，而這是阿列克謝耶夫無法原諒的。更令人不快的是遇到自我感覺良好的外行人，阿列克謝耶夫認為這些人自我阻礙，也阻礙了其他人：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開始有某些人從莫斯科來到北京，他們不僅對中國文化的博遠精深毫無概念，對中國的整體概況更毫無頭緒。從這些後續來到的人（大使館的職員）看來，想必他們壓根沒研究過這裏的語言及國家。⁴³

這些政府機關本應拉近並增加與外國的聯繫，可他們雖住在這個國家，卻不認為自己在職務期間需要了解該國語言和文化，既不好奇，也不感興趣。阿列克謝耶夫總是認為這種人比敵人來得糟糕，他無誤地察覺到這種「基因」在前來聽演講的聽眾身上成形。他無法原諒，他也知道他們最後只會「自我阻礙，也阻礙了其他人」。加拉罕抱怨一些年輕人哪都不去、啥都不知（卻到處跟人談論）、連英文都不會說。阿列克謝耶夫對此也以抱怨回應，他說教授沒能挑選有天分、未來可以成為著名專家的學生，政府卻「給我一堆鵝卵石，還想要我把他們磨成水晶高腳杯」。

加拉罕提出的問題非常廣泛，其中包含傳統歷史的問題，例如：中國對於「政府」概念的起源、日本對「愛國主義」的解釋⁴⁴。阿列克謝耶夫在日記中責備在北京工作的漢學家：「難道都沒有人跟他說過嗎？」這些漢學家不想分享這些知識，他們躲避或是懶散的態度總讓阿列克謝耶夫感到憤怒。

在一次參訪中，他們談到在莫斯科發行的《新東方》雜誌（*Новый Восток*，1922年創刊），這是一本以政治經濟為取向並常常介紹各號人物的雜誌，可卻從不採用中國的文獻資料。阿列克謝耶夫嚴厲地表示，這些文章就像舉著「當代」之旗幟推廣漢學的無知；加拉罕則以較溫和的口氣評論：雜誌中有許多拙劣之作，但這種文獻是被需要的，儘管裏面一個人也沒有（但他更篤定地稱某一個出版人為——無賴）。這次的談話明顯針鋒相對，並觸及許多尖銳的話題。談話的最後，加拉罕建議阿列克謝耶夫「主持中國人研究中俄文之事宜」。阿列克謝耶夫在日記中還提到：

他想要利用我提供寫書的資料。關於多本書的論文書寫是最能使他焦躁不安

⁴²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 . .,” с. 15.

⁴³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169.

⁴⁴ 術語「愛國主義」的文字是在日本成形（愛國主義），後來才在中國使用。

的：寫！寫！寫！

最後一次見面，兩人詳細討論在北京成立中俄研究所的計畫，能夠互相研究、交換出版品及學者。他們把漢學家分派到幾個地方：葉庫什克 (Иркутск)：什圖金 (А. А. Штукин, 1904-1963)；莫斯科：王西里 (Б. А.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海參崴：龍果夫 (А. А. 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他們也談到出版漢俄及俄漢雙解辭典等事。顯然，要涵括這些主題，無怪乎三次（九小時）的會晤不夠。

加拉罕的認真及氣魄留給我非常好的印象，他不是個老古董，而是一個積極的人。如果不喜歡這個人的話，可就不大聰明了。

在日記中，阿列克謝耶夫這樣說著。而在記事本中，阿列克謝耶夫將和加拉罕對話的主題分在一個名為「新展望」(Нов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的特別欄項。這樣雖然好，但是阿列克謝耶夫無法預見這些展望的未來，尤其無法預見加拉罕會在一九三七年遭槍決，就如同王西里的命運。在一九三八年被捕的什圖金雖逃過了槍決，卻被流放到馬加丹 (Магадан) 和諾里爾斯克 (Норильск)。

在「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帶領下的漢學家參訪」中，阿列克謝耶夫認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是為亞洲博物館籌得書籍，促進東方活語言研究所及塔爾瑪巧夫軍事政治學院 (ВОПАИТ) 的教學。這些機構保證會提供資金，阿列克謝耶夫根據書目，提早列出欲取得書籍的清單，並在抵達北京的第一天，便盡量抽空來實現這項計畫。但是，沒有任何撥款到他手上。

我整天都待在琉璃廠⁴⁵和商務印書館，照著目錄為研究所和軍事學院瀏覽、挑選書籍（可是卻沒錢），我還常常殷勤地提供空間來擺放成堆的書……我一直替博物館買大量的書籍，為研究所買胡適的著作（只能先賒借：那來的錢？）……我常常陷入負面的情緒，因為什麼都不敢買……明天就是決定性的時刻了，我得去看看有沒有買書的特別經費。不然那些書就真的只能看看，不能買了……我來寫封辱罵的信……我的任務——見鬼去吧！忍無可忍！對未來的旅者也是個教訓，別傻傻相信出差會有錢用！

阿列克謝耶夫被匆忙地派到中國，雖然他成功取得的經費承諾對他無疑是種希望，但官僚的阻礙仍大過一切承諾。直到最後幾天，阿列克謝耶夫還在等待約定的款項，才動身離開北京，他將款項的委託書、帳單、書單和做滿紀錄的目錄留給漢學

⁴⁵ 琉璃廠是北京的街道之一，從以前（十七或十八世紀）就有很多家書店。

家蒙瑟列爾 (Г. О. Монзлер, 1900-1959)。蒙瑟列爾得以運用最後才送達的不完整款項。更讓阿列克謝耶夫感到氣惱的是他都已經選好，並且也打包好北京大學的出版品 (新中國學者的作品)，但蒙瑟列爾卻買不成那些書，因為等他下次到書店時，書早就被解體了。

阿列克謝耶夫也提到他回程是走海路，從上海到馬賽 (當時已無符拉基米爾佐夫)，經過香港、新加坡、檳城、可倫坡、亞丁、蘇伊士、塞得港——這是在北京歷經緊張又炎熱的半個月之後的奇異海行。阿列克謝耶夫原先預期的興致卻被一位英國乘客帕爾默 (Палмер) 徹底打壞，他和「白人」(white man) 一樣憎恨著「紅色俄國人」(這也是阿列克謝耶夫預想不到的「標籤」)，整趟旅程中不斷惡意地煩擾阿列克謝耶夫。

就像所有現在的學者一樣，阿列克謝耶夫也無法安於普遍認定的思維，也就是無所事事——休息要爲了讓腦子擺脫干擾自己的外在因素。就算在遼闊的海洋上，阿列克謝耶夫也會坐在靠近船舷的扶手椅上，繼續寫他的綱要：

周圍的人都在訕笑、調情，全部人都在玩高爾夫球，或聚在吠叫的留聲機旁跳狐步舞，而我在這樣喧鬧下，只有讀書或睡覺，什麼都沒聽到……我做了很多，準備演講稿和旅行摘要，研究歐式中國風 (китайщина) 並寫下摘錄。雖然有時的確也會產生懷疑：「打打高爾夫是不是真的比較好？」但能從容自在做自己的事，而海洋就在自己眼下的極好氣氛則勝過一切。

寫完自己所有在北京看到、知道與計劃的事情，看來是複雜的事，往後的事業又更加複雜。

在阿列克謝耶夫寫給妻子的日記中，他不只一次提到往後「事業的完成」。他在引號中選擇這些字，是因為這些原則上都完成了。這次參訪是爲了蒐集書籍，並與新中國的漢學家建立關係，但由於參訪倉促，加上資金中斷，阿列克謝耶夫認爲這次的參訪並沒有太成功，不過這爲往後的參訪立下基礎，依「研究所」的形式 (與加拉罕談過的話題) 促成共同合作與個別秩序。當時曾有人告訴阿列克謝耶夫，他再也去不了中國了，但他活得健健康康，所以他就是不懂，也不相信：怎麼會？爲什麼？

躺在微風中，在特別的小本子上寫著結論。也許這是無益的，卻是未來改善事情的道路……我寫著，海浪上有成群的海豚蹦跳著，就像小狗一樣，很有趣。

在每個快速閃爍的碼頭城市，阿列克謝耶夫都會在街道上散步，不管自己嚴重的扁平足，只是爲了「貪婪地到處看看」，什麼都不想錯過，記住所見所聞，同時也不忘尋找書店：

檳城。我走在又大又擠的書店裏，寫下一連串的书名——售貨員卻不停搖著頭，周圍的人都充滿古怪的好奇心。我買了胡適的《嘗試集》和檳城出版的書店總錄。

胡適與其《嘗試集》很快就成爲「中國文學」系列最後一講的主題，阿列克謝耶夫隨後就在法蘭西公學院 (Колледж де Франс) 與吉美博物館 (Музей Гимэ) 發表。他在船上記下關於胡適的筆記，閱讀梁啓超談論文學的文章（「他的見解有挖苦的味道，非常適合陳列與評論」）與其他一些「新中國人的作品」，其中大部分的文章都在談論教養問題。

閱讀柯濟⁴⁶（音譯：Кэ Цзи）的〈論教養之意義〉（О значении воспитания）一文摘錄，她是個講話尖銳的中國人，與其說她嚴肅正經，不如說她發發牢騷，但她觸及了教育的道德基礎問題，說這奠定在我們的思想之上。我略述一下：中國教養問題與其解決之道——全都沙堆上，不可靠。應當小心建立在各因素的對比之上，以及東西方對比之上。

針對這個問題，阿列克謝耶夫也和許多中國旅伴討論過——大部分是從事貿易的商人：

與他們的對談有一點無趣，但很有幫助，因爲沒什麼可以在這個環境基礎成長更多……賣馬達的廣東人，是個循舊方法學習的中國人。有趣的是在當代中國有些東西，像是不好不壞的新事物。他用舊方式教自己的孩子：貿易最好照舊，處事最好求新。

中國教育始終都是極爲複雜的問題，不過阿列克謝耶夫也沒錯過機會聽他們反駁那些談論「教育改革」的人——報刊上不斷爭論的主題。他訝異地發現那些認爲自己是舊式教育出身的父輩，竟對小孩的教科書不感興趣，也對小孩的學習方法和對象一無所知，世代間的差異日益明顯。

阿列克謝耶夫以細小的筆跡在另一本記事本寫下：

一九二六年夏季赴蒙古及中國之成果。輪船箱崎丸號 (Hakozaki maru)。

⁴⁶ 譯者註：應爲筆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參訪的成果與這期間確立的規劃共分成十八項，其中七項與圖書檔案室有直接關係，其他的項目則有間接關係：「〔對書籍交換〕有益的熟人」、「缺書清單」、「責任」。其中特別一區提出了四十個問題給通信人（例如：近十年的參考資料、近十年新舊中國對照的上乘作品），幾乎所有問題都和現代中國學術，或是和中國當代有關。寫下這些諮詢問題後，想必阿列克謝耶夫冷冷地笑了一下，同時回想到不久前聽到關於自己的「謠言」……就嘆了一口氣：

我所獲得的卻以責任及書信往來使我備感壓力，但我該拿這些包袱怎麼辦呢？該拿缺書目錄怎麼辦呢？「萬物邏輯」——人生的負擔……簡單來說，在亞洲博物館，今後我只能從事「政治」與通信了。

因此，總結對阿列克謝耶夫來說可是不容易，也不簡單的事，歸途時，他在年度報告中記下：

吾人成功建立起個人、學術，及中國學術圈大人物、歷史博物館與圖書館的保管員之間的聯繫，也讓亞洲博物館不再與中國的相關機構脫離。

而在一九二八年的年度報告中，阿列克謝耶夫已經可以得意洋洋地寫下這些個人與學術連結的成果：

在亞洲博物館有中國現代最著名學者王國維、羅振玉、梁啟超等人的著作。關於中國科學史、經典著作研究、即將消失的古語研究、中國文化與西方衝突、中國印刷術史、戲劇史、短篇小說的研究與宣傳（中國文學現代與未來發展的重點）、長篇小說史、辭典學等一系列書籍。少了這些中國學術文獻，漢學家就沒轍了。

在這些學術連結中，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無疑占了重要地位。從年度報告可看出，袁同禮早從一九二六年起便開始將北大的圖書目錄寄給亞洲博物館。他的信從各地一封接著一封地寄來：中國（北京、昆明）、歐洲（柏林、布拉格）、美國（華盛頓）。以上提到的就超過六十八封信與兩張明信片，內容當然有包含歷史學家會感興趣的學術資料。可以堅定地說，回信的數量一點也不少：阿列克謝耶夫不僅一定回信，還會主動回信，只可惜在中國仍然找不到他的信件⁴⁷。內容如此詳細的通信很明顯是圖書交換，這「有利於學術也應當成爲穩定的事業」。引用的敘述來自

⁴⁷ 在阿列克謝耶夫的檔案室裏（目錄3，102號）只有三封不知爲何沒有寄出的信件。

一九二九年二月「〔阿列克謝耶夫〕致科學院常任祕書之計畫申請」，也就是他被選入科學院之後，計畫申請書中的一項重要項目被稱為大事業：

與北京圖書館的特別圖書交換。北京圖書館現今已建立起館內〔各系統〕大圖書檔案室之圖書編目，而如果我們想得到他們目錄卡的副本……那我認為，我們也應該建立一模一樣的〔目錄卡〕……在繼續發展這種有利於學術也應當成為穩定的事業之際，我也發現，爲了要取得我們需要且只有在中國才能獲得的中國文學及書目彙編，我們應該突破本位主義的桎梏，例如：爲了交換我們需要的中國圖書目錄的手抄副本，我們也要提供中國人更感興趣的作品手抄副本：杜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等。⁴⁸

在計畫申請的下一項，阿列克謝耶夫構想了與北京圖書館間的部際合作，並在文件最後列舉了幾個結果。最後一項（並非按重要性排序，只是依順序）應當是建立「圖書編目，作爲中國文學史的學術基礎。這是我們未來要撰寫的中國文學史，而不是抄錄已定案的文學史」⁴⁹。

一九三一年，阿列克謝耶夫在東方學研究所與來自中國的學者（其中包括袁同禮）會面，接著他在「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之一九三一年報告」（Отчет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кабинету ИВАН за 1931 г.）中描述了會面的場景，當時應該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也是！）：

袁同禮教授是與研究室最常聯繫的人，他持續與研究室主任通信並交流出版品。因此，爲了與他會面，特別開了一場學術會議，當中有許多教授都發表報告：袁同禮教授「現代漢學的任務及方法」（英文，Задачи и метод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инологии）；舒茨基教授「研究《易經》的當前問題與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對其之研究」（德文，Очеред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Книги перемен» и работы над нею в Китайском кабинете ИВ）；王西里教授「現代中國文學與東方學研究所中國研究室對其之研究」（中文，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работы над нею в Китайском кабинете ИВ）；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危機中與新道路上的漢學」（法文，Синология в кризисе и на новых путях）。這場袁教授特別參與的熱烈討論無疑是研究室特別會議最好

⁴⁸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205.

⁴⁹ Там же, с. 206.

的成果，也讓我們與中國學術建立起聯繫。⁵⁰

不過，且再回到日本輪船箱崎丸號開往馬賽的航程，來到航程的倒數第二座海港城市——塞得港。阿列克謝耶夫又一次從大街轉進小巷漫步，這樣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城市的生活。當他親眼見證時，他在日記中寫下這樣有趣的插曲：

我遇見一群外國人，我猜他們是俄國人，他們走在我後面：他大概就是俄國人……的確，我的褲管裏、西裝上衣夾在腋下、我的小帽裏——沒錯，就是俄國人，還會有誰呢！應該爲了旅程打扮打扮，而我又捨不得花錢……。

有一次，阿列克謝耶夫在巴黎不得不花錢買套裝，但他省下的大部分錢都用來支付一位優秀的法語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陶醉於學習成語，以便運用於文中，也純粹爲了滿足自己。他從來沒有這麼滿意自己學習外語的程度，甚至認爲沒有東西可以超越。在法蘭西公學院和吉美博物館，阿列克謝耶夫總共舉行了六場演講，而最後一次（如先前已經提過的）是有關胡適及其詩歌語言革命。阿列克謝耶夫在法國東方友誼會（Француз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друзей Востока）演講了「論現代中國的幾個文學問題」（*Sur quelques problèmes de la littérature de la Chine modern*），在年末（以摘要形式）出版⁵¹。

由於旅途勞累加上精神疲憊，阿列克謝耶夫從巴黎寫信給妻子：

我很想回家，但也只能希望，畢竟我知道在極度喜悅之際，等著我的還有那些雖然細微瑣碎卻令人厭惡的不悅之事——懲罰、調查、詭計、陰謀和誹謗。

所有一切曾是如此，而儘管過去的也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之所以會有種種的不快，主要是因爲阿列克謝耶夫不斷對東方學家提出要求，既不寬容也不遷就，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夠或認爲必須臣服於這些要求。衝突一再發生，原因每每不同，且並非每次都像理論那樣有內情。《東方學》文集中的文章及資料無不反映出那幾年的對立衝突，在後序中，我們可以讀到：「二〇年代的風風雨雨——中國革命愈演愈烈，中國人民爲擺脫君主制及封建制而鬥爭，力求解放東方的蘇聯青年冀望能盡快給予中國援助——這些事件在大學課堂上也引起加快授課的不正當訴求，來迴避精

⁵⁰ Там же, с. 210.

⁵¹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s amis de l'Orient. Nouvelle série.* 1926, XII, № 8, с.3-6. См. в Библиогр. 1 ед. хр. 509.

通漢語所要付出的長期努力。而這種努力對於身為漢學家的必要性，亦廣受討論，甚至也讓頑強的反對人士阿列克謝耶夫大惑不解，他深信『我們的事業對待我們，遠不及我們對待它那樣寬容遷就』⁵²。他理解別人的焦躁不耐，也了解他們的原則及公民立場（也可能是極端主義的，但話說回來他也做不到），這令他深深痛心。如今……我們能夠見到飽受非難卻屹立不倒的阿列克謝耶夫清楚地區分真摯的信念與追求功利的欲望，這些欲望都由引戰的門外漢帶來，他們都在類似事件中出現，還帶著教訓的口氣。」⁵³

在阿列克謝耶夫的檔案室中保存著一份標題驚人的文章草稿：「中文對漢學家的必要性」(Нуж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итаеведу)——必要到有論證的必要！如此，不妨詳細闡述一下阿列克謝耶夫〈近十年來列寧格勒東方學院之漢學家〉(Китаисты ЛВИ за 10 лет)一文（貼在海報上）中，被艾德林援引過的一段話（文章寫於一九三〇年。當時正是各家爭論最熾烈的時期，都起因於新中國研究的不同原則），藉此使「寬容遷就」(снисходительно) 這個深具威力的詞更易理解：

有正面結果〔漢學家在中國的駐地〕的同時，也有負面結果，假若情況好一點的話，算是普通的結果。這裏除了個人志趣，對通曉語言的不重視也是一大缺點，而這卻是進一步（特別是原則）成就的首要且基本的工具，這些成就是很難仿造與作假的。上述這種課程轉變的情形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不論聽課者是延宕授課計畫，或加快教學進度，他們都必須記住，我們的事業對待我們不像我們對待它那樣寬容遷就。新中國專家的難題比起以前愈來愈複雜，一年比一年更多（特別是在閱讀與研究政治等問題的速度上），而且絲毫沒有減慢。漢學家，我們的初學者，當然可以原諒自己許多事，但在中國，他們總體來說，著手太晚，且特別是從自我原諒開始。過分地習慣展示經驗，也讓異常快速與固定不變成為習慣。⁵⁴

阿列克謝耶夫所說的嘗試，當然也包括了一九二六年夏天他的觀察與加拉罕的談論。他敏銳地嗅出現實與空想的差異，感受在時代精神中深入研究與日常交談的區別，因此盡其所能地阻撓那些如雪崩般而來且不負責任的文章。例如：「有大量文

⁵²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исты ЛВИ за 10 лет,”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218.

⁵³ Эйдлин с. 451.

⁵⁴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218.

章一眼看去是針對中國生活各種問題的迫切文章，但實際上卻是一味放肆地批評現象的表面，阿列克謝耶夫感到相當氣憤。比如，他問道：『難道這些基於目前既有資料而未用中國史實加以補述（補述需要一些更為廣泛的知識）的研究，會比那些廣受大眾喜愛並著眼於當前經濟問題的諸多研究來得科普嗎？』⁵⁵ 這不如說是反問：阿列克謝耶夫希望能『根除業餘且缺乏專業權威性的單方面研究』。⁵⁶——以他的定義來說，根除無藥可救的一知半解者。

阿列克謝耶夫把一知半解稱為撒旦的特徵，無論是何人、何時、何地都絕不饒恕。彼得羅夫寫道：「漢學研究的進步，阿列克謝耶夫亦曾將之與學術批評聯繫在一起。他認為對任何一個學說、任何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假設做出批評，乃是理所當然，儘管這些學說、結論和假設是最具權威且頗負盛名的研究者所提出。阿列克謝耶夫，如先前所述，強調新中國漢學的特殊地位，但這完全不代表他無時無刻都會認同它。相反地，他警告漢學家不要『步伐膽怯而在中國學術界吊車尾』。」⁵⁷ 彼得羅夫引用阿列克謝耶夫的文章〈漢學家的展望〉（頁 305）中更加尖銳的詞句：

我在評論文章中極力反對在一片嚴謹的中國事業中的任何不嚴謹（評論《中國人名大辭典》一文），我強烈抨擊中國人的眼光短淺及懵懂無知（特別是在創立西方漢學這方面），就連西方人也差不多如此。我反對卑鄙無恥的行徑與流於庸俗的幻想……我在報章中反對極度單方面且過於自我吹噓的學說，如蔡元培、徐世昌，及反對一切高傲狂妄……。⁵⁸

艾德林把阿列克謝耶夫稱作是有著桑丘容貌的唐吉訶德，這讓我們想到一個想像力豐富的傳奇荷蘭男子，還嘗試用手指堵住水壩的裂縫，阿列克謝耶夫就是這種蠢蛋的其中一位。而外行人（即「無知者」）這股力量在決口的水壩後面，像是阿列克謝耶夫要為他們施洗一樣。

在那幾年為人接受的術語「再造」（перековка）強烈地影響了信念智慧，暴行被強加於個人。應當接受再造的學者被劃分為已再造（意即優秀學者）及未再造（拙劣學者）。阿列克謝耶夫則屬於「未再造」之列（偉大又強力的民族能夠撐過一切，

⁵⁵ Алексеев В. М. “Советская синология,”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130-131.

⁵⁶ Эйдлин, с. 450.

⁵⁷ Петров, с. 27-28.

⁵⁸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 313.

但對人們來說這如何能承受？！)。

對峙愈趨緊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武器的「無知者」(игнорант)對這位卓越的(就像現在一樣有名)科學院士展開清算,反對上級機關的祕密指示。一九三七年,在巴黎出版了阿列克謝耶夫的個人專書,內容是他一九二六年在法蘭西公學院關於中國文學的系列演講⁵⁹。該書在國外出版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的效果有如 TNT 炸藥一般:一九三八年春天,《真理報》(Правда)上出現一篇雙署名的文章,其中一位是東方學研究所學術祕書哈珊·穆拉特夫(Хасан Муратов)⁶⁰。在此不再重述《中國文學論文集》書中(第1冊,頁143-148)阿列克謝耶夫對法文版〈自評〉(Авторецензия)的序言內容⁶¹,不過卻不能不分享這苦澀的喜悅,就在我看到國內評論文章(這是《真理報》抨擊性文章的主要來源)作者拉度里·薩圖洛夫斯基(Я. Б. Радуль-Загуловский, 1903-1987)出現在帕米朗茨(Г. Померанц, 1918-2013)的文章所體會的。這麼說吧,同樣的情境:帕米朗茨談論在六〇年代被同一位學者(現在已是哲學博士)寫過的「告發」(доносе),也讓他有機會讀完並欣賞這份「告發者文辭優美的諷刺小品」⁶²。

在「冒牌學者」(лжеученый)這種標籤之後出現的,是在那幾年裏相當普通(也可以說是「陳腐」)的標籤:「全民公敵」(враг народа),從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及大學中的審查紀錄(《真理報》文章出現之後),可以清楚看見。

我想阿列克謝耶夫終究並未充分評斷這好似深淵的現實,因為凡人都難以評價荒誕的現實。但更糟的事發生了:在一九二六年的旅行記事本中,可以看到「受募經紀人」(завербованные агенты)⁶³(這才叫講究術語阿!)的地址——想當然爾,這是為了中國與歐洲間圖書交流所做的安排。您覺得這本阿列克謝耶夫引以為傲的小冊子(「成功建立起個人、學術之間的聯繫»)被放在審查員桌上會……。

⁵⁹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Six Conférences au Collège de France et au Musée Guimet* (Novembre 1926) par Basile Alexéiev. P., 1937, 232 c .

⁶⁰ Муратов Х., Буров М. “Лжеученый в зва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академика,” *Правда*. 31.05.1938, № 148 (7473), с. 4.

⁶¹ В. М. Алексеев,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Б. Л. Рифтин,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3. Книга 1, С. 143-148.

⁶² Померанц Г. “Без покая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05.02.1997 (№ 5).

⁶³ 又可譯為「被吸收參加的間諜、密探」。

一九三八年，阿列克謝耶夫覺得要再過這種生活，他辦不到，但日子就這麼過了。一九四八年，舊的標籤上又多了新的：「世界主義」（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和「學院派」（академизм）。阿列克謝耶夫針對斯特魯威（В. В. Струве, 1889-1965）的報告「論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結果對東方學的意義」（О значении итогов сессии Академи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им. В.И. Ленина дл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發言，報告提到應讓東方學問題配合李森科（Т. Л. Лысенко, 1898-1976）在「形式」遺傳學上的勝利，阿列克謝耶夫很費力才能理解，「具有學術性」的高度讚賞與學術知識的保障如何轉為指控責難，他在發言時呈現了自己著作的清單，其中計有三十九本與當今的新中國有關（當中許多著作均被彼得羅夫引用過）。不再對不切實際做出指控，阿列克謝耶夫得以用自己的方式讓漢學具現實意義：

要讓漢學具現實意義，需要改建我們的圖書館：需要不同的參考書、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辭典、索引、報紙、學術及文學雜誌，上述這些，我們現在都沒有。

要讓漢學具現實意義，需要在中國實地考察——這是基本常識，這就跟地質學、地理學、民俗學等同樣道理，其他一切形式的實現都會有淪於空談理論的風險；要讓漢學具現實意義，需要定期邀請中國黨員學者教授來巡迴演講，教導該如何閱讀中國的語言、歷史、經濟及文學；要讓漢學具現實意義，需要在新中國文學界裏具有強力的翻譯工作，但可惜的是，這並非總是辦得到（舉例來說，魯迅的所有文章就只有我有而已）。

半年之後的一九四九年四月，阿列克謝耶夫被一場對他來說是最後一次的意識型態風暴籠罩著，這迫使他回想起一九三八年那年。「世界主義」、「唯心主義」（идеализм）及「資產階級客觀主義」（буржуазный объективизм）的標籤牢牢地貼在他身上，就好像雖然只有少量的血，卻被人下毒似的——很快就惡化成癌症。

如今已經難以理解，要如何在新的壓力之下存活，以及如何在這情形之中保持自己的立場，還繼續工作。在阿列克謝耶夫的自白裏有聲明：「我理解未來更甚於現在。」「更甚於」聽起來就像「我對於未來有最好的見解」。當時就是這樣，而且這可以協助他承受這令人難以忍受的現在。並且阿列克謝耶夫終究還是不善於記恨（所以生命力強？）；阿列克謝耶夫戰勝了不久前不顧一切欲剝奪他學術名位的殘害者，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的會議上，發表報告「中國新的書面語言問題」（Проблема нов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在《東方學》後序中，艾德林清晰有力地談論了阿列克謝耶夫在一片「落後」(отсталость) 謾罵聲中堅定不移：和前輩不同的是，「他了解漢學的真諦，並捍衛他以智慧與經驗戰勝的一切」⁶⁴。阿列克謝耶夫在寫給自己的筆記中，提到這帶來了什麼價值：

有時候我會想，活著是值得的。哪怕是為了感覺自己被青年人罵成悲慘落後的人；然而，這並不是那樣的，你年輕又充滿著既廣闊又深刻的思潮，那些思潮從世界的各個盡頭走向你，而不單從你自己的小角落。

被打上記號，將荒謬的標籤貼在自己身上，並感覺自己在這些標籤前的無能為力（因為那樣「背景」有著荒謬的歷史狀況及莫名的人們），這些難道不是真正的不幸、痛苦和侮辱嗎？！不過，知道「漢學的真諦」並具有捍衛它的力量，難道這又不可會是真正的幸福呢？！廣闊又深刻的思潮，這是幸福人的封地。對學者來說，這就是阿列克謝耶夫所謂為學術情感(научное чувство)，或者稱為激情(пафос)的東西：

學術需要熱情，否則就會變成一種手工業，彷彿成了學術事務的辦事處，而激情是無法訂做的。由此可見，學術的問題趕不上真理與生命的問題；古老東方的問題（等同於：文化觀點的起源）趕不上新潮東方的問題（等同於：真理與生命）。

在那久遠的年代，趕不及理解資訊就已讓阿列克謝耶夫感到恐慌，而他要是在現代會說什麼？依他的遺訓，漢學家應該「鑽研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才能夠了解其完整樣貌與細微局部，並明白是什麼在引導著文明中國的命運」⁶⁵。

有一個明顯的事實不斷引起阿列克謝耶夫的恐慌，那就是文化中國竟比俄國還認識與了解俄國。阿列克謝耶夫經常強調並也相當明白，若對鄰居不能有通盤理解，那恐怕要付出代價。不過，如同時間所證實，他闖進的並不是一道開放的大門。現在讀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時，哪怕只是偶爾一讀，都將會訝異於當中出現的俄國名字——出現最多次的當屬普希金，而且除了直接提到外，還有內心累積的聯想記憶喚起的。張賢亮中篇小說《綠化樹》(1984) 中一個偏遠的中國小鎮，主人公想著：「喔！雪，你造就了普希金！」就像附和巴斯特納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 說的：「用普希金和雁與雪押韻。」(Рифмует...с Пушкиным гусей и снег.) 謝

⁶⁴ Эйшлин, с. 452.

⁶⁵ 引自〈十月革命映照了中文和中國文學的演變與革命〉。

天謝地，這並不少見。滿心喜悅，卻又感到憂傷；從來沒聽過任何人〔俄國人〕看著月亮嘆氣說：「喔！月亮，李白跟你一起喝過酒。」必須理解，阿列克謝耶夫幻想中國哲學與文學能進入讀者的日常生活中。雖然過去幾十年來已經接近目標了，但尚未達成，不過相信一定能夠達成。

阿列克謝耶夫的所有活動，都是爲了多方加速這個若一拖延就顯得危險的文化相互滲透過程。他不限定於任何範圍，只想找出並訂立具體的計畫。特殊的是阿列克謝耶夫在〈羅馬賀拉斯與中國盧清談論作詩技巧〉(Римлянин Гораций и китаец Лу Цзи о поэтическом мастерстве) 這樣學術性的文章中，也以公文方式建議提案做結，但出版時爲了縮短篇幅而刪除這段結論。這頁手稿連同錄音檔案裏那懇切的聲音，傳達了阿列克謝耶夫本人定義的積極「勞動的熱情」(рабочий энтузиазм)口號。

爲了推廣中國文化（不只是關於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現在需要有責任感的翻譯人才來翻譯。但這些都只是治標不治本。在我看來，在戰爭後，中國就像其他國家最終必須向世界介紹自己，不能用挑剩的知識(оборыши знаний)⁶⁶、零星的傳單和落後荒誕的相關書籍等等，而是借助完善的文學，從特別針對中國的百科全書開始（就像其他國家），而不是僅含二十個名字或文章的其他書籍。假若《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中只包含這種參考性的文章，那麼《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Sinica*)（《俄羅斯百科全書》[*Rossica*]、《西班牙百科全書》[*Hispanica*]、《義大利百科全書》[*Italica*]、《伊朗百科全書》[*Iranica*]等等）就應該以英語（國際單一的思考辦法）「完整」呈現中國文化，爲了自己的國家，沒得選擇，什麼都不能拋棄。如此一來，世界的文化最終會傾向彼此，就像現在沒有國家有「特權」自負地重複：我們（蘇聯）對中國一無所知，或者是我們（中國）一點都不了解俄羅斯。屆時，整個世界將能完整理解彼此，而不是只有片段又隱晦地理解，能在各個情況下比較，思考比較的事物。接下來，進一步的求知慾及學術準備，就能找到不同的途徑與速率；而不像現在人們坐著學習語言，卻對那個國家與文化一無所知，無法理解其根源。個別來說，談到中國時，我

⁶⁶ 挑剩的(оборыши)——把最好的挑走後剩下的東西，引申爲不好、無用並比其他還差的東西。請參見《現代俄語辭典》(*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第8冊，莫斯科、列寧格勒，1959年，頁342。該詞意義的解釋也出現在達里(В. Даль)所編的詞典(第2冊，頁584)。

很輕易地理解到，這些漢學初學者若有這些百科全書，那他就不再是初學者，而是成熟的學者。精通語言的過程對他來說，已經不再是解決許多未知數的方程式解法。到現在若是要用此方法解決文本問題及定義問題，很少能夠成功。

當然，能夠以歐洲廣為人知的樣本編撰百科全書，例如：《伊斯蘭百科全書》(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слама)、《希伯來百科全書》(Евре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等等，但也可以計劃將一七二一年的大中國百科全書《圖書集成》(包括這兩個世紀來的相關增補內容)翻譯成英語。我估計一百個精通英語的中國人(是有這樣的人)並且能完整理解中文的(這種也一定找得到)，加上至多二十至三十位的英語編輯，在十年內必能譯出一千冊《中國百科全書》，但每冊價格卻不超過二十至三十美金。這樣一來，整個中國歷史將不再以轉述或故事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國的過去，而是以原文的全面摘錄(當然是附有注釋)的形式呈現，因原文具有完全不同的價值。法語的佛教百科全書《法寶義林》(Hôbôgirin)雖留有歐洲形式，但為了其效果，仍修改大部分的形式，不過為了加速翻譯及作品完整性，修改形式是必要的。

或許一些贊同這些事的年輕人能活到《世界百科全書》(Миров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出版的時候，裏頭所有的文化都能得到應得的關注，而世界最後將中止扮演彼此分離的無知者角色，不可能不認識、不希望或沒有機會了解彼此。

《世界百科全書》的想法在眾多渴望彼此了解的人們中，不可能得不到迴響，最有力的證明就是現今對中國文化遺產的興趣(關於此的中文文章，請參照目錄四)。由南開大學閻國棟教授翻譯的阿列克謝耶夫《一九〇七年的中國紀行》(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1958)最近回到中國，接著是《東方學》的翻譯。不應該忽略那些沒被注意或是已更改過的中國文學相關書籍。滿懷熱忱的閻教授不僅只想翻譯一本阿列克謝耶夫的著作，他說道：「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爲了俄羅斯，也爲了中國生活與工作！」

如同孔子的遺訓，時間會替一切正名。不妨將這段遺訓簡單地理解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那麼接下來，最終結果就是：「則民無所措其手足……。」⁶⁷ 永恆的真理永遠都處於未消逝的迫切性中。

⁶⁷ См. с. 337-338 наст. кн.